

An Introduction to Hong Band Culture

红帮文化通论

陈星达 冯盈之 张 艺 张宏儿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n Introduction to Hong Band Culture

红帮文化通论

陈星达 冯盈之 张 艺 张宏儿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帮文化通论 / 陈星达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308-13238-1

I. ①红… II. ①陈… III. ①服装工业—工业史—宁波市 IV. ①F426.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7859 号

红帮文化通论

陈星达 冯盈之 张 艺 张宏儿 著

责任编辑 朱 玲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238-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 前 言

红帮是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独特和重要的行业群体,由晚清之后一批批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宁波“拎包裁缝”转型而来。20世纪30年代,红帮成名于上海,并逐渐蜚声海内外。

红帮揭开了中国服装现代化的第一页,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从19世纪中叶至今,红帮在其百年传承中,不但创造了中国服装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而且通过不断积淀生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业群体文化——红帮文化。

在中华母文化中,红帮文化虽然只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亚文化或次文化,但就其行业影响力而言,它却是中国现代服装业的文化灵魂。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印象是由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亚文化凝聚而成的,每个人的态度,每个群体的面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国家主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影响中国留给世界的整体文化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帮文化当然也是国家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子,因为它除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念之外,也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国家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宏大背景之下,进一步研究、传承与弘扬包括红帮文化在内的民族优

秀文化,毫无疑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其价值在于为民族文化学、群众文化学、企业文化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大量鲜活的材料,并以此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其次,这是繁荣中华文化,促进全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其价值在于通过全方位地记录红帮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它在行业中的深刻影响,提炼与创新红帮精神,提高全社会对红帮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这是依托行业办学的高职院校特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价值在于为高职院校将“校企合作”由技术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提供理论支撑,同时通过校企文化融通和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职业品格。

不过,红帮文化真正进入学界的视野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对红帮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迄今为止,专家、学者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注重对红帮史料的研究。如季学源、陈万丰主编的《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宁波市政协主编的《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文史出版社,2005年),季学源、竺小恩、冯盈之等编著的《红帮裁缝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二是比较注重对红帮技艺的研究,如刘云华的《红帮裁缝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益正、王以林的《红帮衣型制版技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应该说,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在红帮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和非常有价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后续研究可谓大有裨益。但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的研究大都着眼于红帮文化的现象层和技艺层,对红帮文化的心态层则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没有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为此,我们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出《红帮文化通论》这样一本书,分别用八个章节追溯红帮文化的形成根基,解析红帮文化的具体表现,提炼红帮文化的核心要素,研究红帮文化的当代传承。目的是弥补红帮文化研究的现存缺憾,汇聚、提炼、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红帮文化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描述,以构建和展现红帮文化的整体风

貌,进而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写这样一本书还有更深的用意,那就是让红帮文化这点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的星星之火与光芒万丈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一起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并散发永恒的精神之光。关于这样一层用意,也许用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的一段话进行概括更为明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实,用习近平这段话做本序言的结束语也是再好不过的了,为免画蛇添足之嫌,余言不再赘述,是为序。

作 者

2014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于宁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红帮源流 / 1

- 一、渊源背景 / 1
- 二、名人名店 / 5

第二章 红帮历史贡献 / 14

- 一、参与颠覆旧服制 / 14
- 二、助推宁波服装腾飞 / 28

第三章 红帮科研活动 / 38

- 一、科研成就与特色 / 38
- 二、名家名著列举 / 44

第四章 红帮职业教育 / 48

- 一、以师徒传承关系为基础的红帮学徒制职业教育 / 48
- 二、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红帮学校

职业教育 / 60

三、红帮职业教育的早期理念与最新
发展 / 68

第五章 红帮精神 / 75

一、红帮的敢为人先精神 / 75

二、精于技艺精神 / 83

三、诚信重诺精神 / 91

四、红帮的勤奋敬业精神 / 104

第六章 红帮文化研究 / 110

一、红帮文化的当代价值 / 110

二、红帮文化研究概述 / 123

第七章 红帮企业文化 / 136

一、当代红帮产业发展状况 / 136

二、当代红帮企业文化 / 147

第八章 “红帮”文化的育人实践 / 159

一、传承红帮文化,确立特色人才的
文化坐标 / 159

二、建立融合机制,推进红帮文化全
程育人 / 161

三、构建九个平台,发扬光大红帮
文化 / 162

四、日积月累,人才培养质量显著
提升 / 164

索引 / 166

后记 / 170

第一章 红帮源流

一、渊源背景

(一) 本帮基础

“本帮裁缝”，发源于宁波地区的慈溪、宁海等山区小镇。这些地方居民世代以务农为生。但农业上的收成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人们不得不从事其他一些行业维持生计。其中，一个重要行业便是裁缝，并逐渐外出营生。

光绪《慈溪县志》记载：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宁波的成衣业早在明代就已打入北京，“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1624年，北京曾有宁波王姓裁缝在活动”^①。宁波的成衣业到了清初就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

由清慈溪人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出版于清道光年间的慈城地方文献《溪上遗闻集录》（卷八）记载：清顺治戊戌进士王枚，中举后旅居北京，期间，

^① 钱茂伟. 宁波历史与传统文化, <http://www.cssn.cn/news/143713.htm>. 2012-07-04.

发现慈溪人寄葬的一块坟地，在明末清初动乱时被当地人侵占，使得“慈人之业艺都门者众，即客死，旅骨无所归”。王枚就组织乡人“约同邑旅宦诸人，鸣之当事，请出之，复为之计久远”，争回了被当地人占去的一大片坟地。这说明当时慈人已人多势众，而且“艺”（手艺，即缝人）更是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行会组织的形成是行业帮口形成的标志，“慈帮”的形成是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初期，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浙江省慈溪县成衣行业商会会馆”的建立。

据记载，在清乾隆年间，宁波慈溪就已在京建立了成衣会馆“浙慈馆”。馆里立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财神庙成衣行题名碑》、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财神庙碑》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财神庙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绪碑的记述最为详细，内称：“在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人氏（今宁波慈城为老慈溪县城），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曰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历年行中唱戏庆贺。”

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慈帮裁缝”在京师十分昌盛。由于浙慈会馆规模大，又有戏楼，每年除本行祭祀、唱戏庆贺外，附近较小的会馆也纷纷商借浙慈会馆进行唱戏祭神。从碑石来看，浙慈会馆起码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就已建成，一直到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再度立碑，可谓历史久远。《财神庙成衣行碑》还刻有当时 73 位“慈帮”裁缝的姓名。

慈城人杨泰亨，为同治四年（1865）进士，光绪《慈溪县志》编修，他在写于咸丰年间的《佩韦斋日记》中对此也有描述^①，写出了对浙慈会馆长期被慈溪来京裁缝占据的不满和无奈，同时又写出了慈溪裁缝人数众多，源远流长，不但用事实把慈溪会馆改成了成衣会馆，而且还设有估衣所：

“旧慈溪会馆在前门外东小市……前嘉靖间袁文荣公炜旧宅边，公捐宅为馆……”“国朝来吾邑宦京师者少，而旅寓多缝人，俗

^① 转引自：杨馥源. 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

竟称为成衣会馆焉。余自咸丰己未抵京，应礼闱试，同乡人有觞余于会馆者，见戏台一座尚在院中，移奉文昌粟主于东厢，其门外则仍为浙慈会馆也。时胡丈友山江官刑部，谓年远无稽规复旧制为难。东院旧有碑，详叙会馆缘起，今为僧人所毁灭云。同治庚午正月二十三日，余偕罗伦言朝宣、周少山咏诣，馆见门屋数间，为估衣所，寓馆之东寓，改造财神殿已北向署门矣，寻石碑有三块，皆系乾隆年间所更立者，另一旧碑石工已凿而新之，冀灭其迹为财神殿之碑碣也。”

上述这些，标志着以“慈帮”为先驱的宁波本帮裁缝已开始形成。

（二）经商传统

宁波位于浙东沿海，背对四明山，这里“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谋什一之利”（上海《四明公所义冢碑》）。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记：“商业为邑人所擅长，惟迩年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本埠既无可发展，不得不四出经营以谋生活。”

宁波重商、惠商的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的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随着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成了浙慈帮发展的首选。清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载：“成衣匠各省具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毕宁波人也。”

一衣带水的上海历来是宁波商人的聚集地。正如《四明公所年庆会会规碑》中所讲：“惟我四明六邑（即旧宁波府下辖的鄞县、镇海、奉化、定海、慈溪、象山六县），地狭人稠，梯山航海，出国者固属众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航运的开通，更加快了宁波商人的步伐。据《上海通志·交通运输卷》，清同治年间（1862）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开通宁波上海间客运，以后又有其他外商及华商加入。“1913年，沿海各线以申甬线客运量最大，1919年接近100万人次。”

宁波裁缝是早期进入上海的商帮之一。《上海通志·商业服务业卷》记载：“清乾隆六十年(1795)，上海县城出现苏广成衣铺，取意所做成衣采用苏州工艺、广州款式。嘉庆二十二年(1817)，上海成衣司邢金备和成衣商朱朝云等8人发起，在县城内郡庙之东(今南市区硝皮弄)建轩辕殿成衣公所，成衣铺有沪、苏、甬帮，至1920年，又有常、锡、镇、扬、杭帮。”

又据《上海掌故辞典》：“约同治以后，苏帮大多改作顾绣业，轩辕殿基本上被宁波帮控制。”^①

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城镇是宁波本帮裁缝的又一拓展目标，如汉口等地。宁海前童人童方根主编的《塔山童氏谱志》记载：光绪初年前童镇沈坑岙的童汉贤、童汉攀二人于“三北创成衣作场”，继起者有童可顿、童长善等百人，甬沪通航后，童九如等去沪开展成衣业务，后由沪拓业到汉口。在1918年汉口总商会所列的各帮会员花名册中，宁波的成衣帮、典当帮、新旧银楼帮、杂粮帮、药材帮均列入其中。

“本帮裁缝与宁波商帮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商帮所到之处，诸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重庆、昆明、厦门、香港等主要大都市都有本帮裁缝的业绩。”^②

红帮裁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身份的历史性转换，完成了新兴工商文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历史性超越，诞生了中国服装史上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创业群体。

(三) 转型发展

“红帮”因给红头发的欧洲人制作西服而得名。红帮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性贡献的创业群体。

清末，由于多种社会变革力量渐次出现以及“西风东渐”的猛烈冲击，服饰趋势逐渐出现多元发展，传统服装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以制作西服为主的红帮裁缝应运而生。他们顺势而为，一改中国几千年的服装制作落后工

^① 转引自：陈万丰. 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② 季学源，陈万丰. 红帮服装史.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艺,率先采用西方立体设计、按人体部位裁剪的技术,缝制出的服装合体适用。

红帮裁缝于19世纪中叶,陆续从宁波农村到上海、日本横滨等中外大城市创业。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红帮裁缝以上海为基地,迅速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群体,并先后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若干个“第一”,诸如:1904年制作第一套西服,1905年制作第一件中山装,1933年出版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等,为中国服装现代化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还涌现出了“爱国西服商王才运”、“西服理论家顾天云”、“国服高手王庭森”等杰出人物。此后,红帮适时抓住历史提供的发展机会,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①的开拓历程。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1956年,上海又有21家红帮名店移师北京,为新中国的服装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红帮裁缝又为中国服装产业特别是家乡宁波服装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现代宁波服装产业,是老一辈红帮裁缝手把手教出来的,红帮裁缝的美名传颂至今。

二、名人名店

(一) 名人名店举要

1. 江良通、江辅臣,父子功臣

江良通字仕有,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在奉化江口(新中国成立前为江前乡,现为街道)一个叫前江村的小村庄。

江良通一家仅靠租赁几亩田,自然难以维持生活。自小头脑活络的江良通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祖辈的生活,一心想着要外出闯荡。江良通决意要去日本闯荡,于是和兄弟江良达合计后一起到日本学习西装手艺。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明治维新后,年轻的江氏兄弟坐着夜航船,沿着

^① 陈万丰. 名扬四海的宁波红帮裁缝. 宁波晚报, 2007-02-01.

剡江,来到宁波,又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到了日本横滨。江良通来到横滨后,找到早在那里从事西服业的宁波老乡学习手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兄弟俩在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8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

江辅臣(成)是江良通的第二个儿子,在上海长大,自小聪慧好学。他高中毕业后,被父亲送到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读书。

江辅臣从圣芳济学院毕业后,其父即让他继承自己的家业,担任和昌号西服店经理。老一辈西服裁缝大多不懂英文,与洋人沟通有语言障碍,而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江辅臣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在和外国人做生意时得心应手。那时候的静安寺路尚属于英租界,江辅臣西装革履,仪态潇洒,用英语与上流社会的洋人交谈,很快打开了局面。

江辅臣接任“和昌号”后,既善于经营管理又乐于扶植同乡同业,因此在业界有很高的公认度。1937年,他被公推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此后连任三届。担任理事长期间,他经常四处奔波,维护同业利益,为红帮裁缝在上海的形成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早期红帮裁缝的创业功臣。

2. 王才运,制作中山装功勋卓著

王才运(1879—1931),浙江奉化王淑浦村人。13岁随父亲王睿谟离乡赴上海,先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跟随父亲改学裁缝;1910年,王才运与同乡王汝功、张理标3人合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口(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6年,3人拆股,王汝功、张理标退出“荣昌祥”,“荣昌祥”由王才运独资经营,资金达10万银圆。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段佳,位于南京东路与西藏路交汇处,是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域;规模大,3层10开间门面,装潢气派,成为当时上海最完备、最著名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

以王才运为代表的红帮裁缝对中山装的定型与大规模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9年,宁波服装博物馆研究人员在上海市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3月26日、3月30日的《民国日报》(见图1-1)。82年前的这份报纸头版刊登了

两则广告,其中一则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广告:

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从3月26日起,这则广告连登三天。

另一则是过了4天的3月30日,由“王顺泰呢绒西服号”刊载的广告:

中山先生遗嘱与服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总理遗嘱也。至于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辛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式样准确,定价低廉。尚蒙惠临定制,谨当竭诚欢迎。



图 1-1 两家服装店在报纸上做的广告(宁波服装博物馆提供)

广告中传递的信息表明,中山装是在上海的宁波红帮西装店定型并由红帮裁缝积极推广的。

当然,据笔者分析,以上两则广告指向实为同一个事件,即荣昌祥制作中山装一事,因为“王顺泰呢绒西服号”是由王辅庆于1926年从“荣昌祥”分立出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

在革命先行者的倡导下,在王才运等红帮裁缝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服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许达昌,铸造金字招牌“培罗蒙”

许达昌(1895—1991),培罗蒙的创始人。原名许恩孚,浙江舟山定海人(舟山当时隶属于宁波)。

许达昌创建“培罗蒙”,至今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拓展和创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培罗蒙”创业的第一阶段。许达昌凭着善于经营的精明头脑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精心打造经营环境,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培育人才,以高质量、高水平,确保得到高层次客户的长期青睐。在许达昌的精心经营下,“培罗蒙”以制作英式绅士西服、摩根礼服、燕尾服、晚礼服、骑士猎装、马裤等西式男装为特色,在众多中外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服定制的“头牌名旦”,被人们称为沪上“西服王子”。

在20世纪40年代末,“培罗蒙”移师香港,这是创业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凭着其一贯拥有的高超的技艺、上乘的质量、精明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培罗蒙”又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培罗蒙”被海外媒体赞为“最正宗的上海招牌”。香港“培罗蒙”客户中名流如云:包玉刚是“培罗蒙”到香港后最初的客户之一,每逢出埠做生意,他都会提前两个月来定做西服;邵逸夫是“培罗蒙”的长期客户,与他同来的还有利国伟、许世勋、李文正等;亚洲首富李嘉诚做西服,“培罗蒙”则派师傅上门服务;还有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荣毅仁父子……“培罗蒙”成了超级富豪和名流们的专门服装店。

以“最正宗的上海招牌”来称道香港“培罗蒙”,实乃名不虚传。

许达昌一直坚持一个准则:“在‘培罗蒙’这块招牌下,我们的西装要坚持传统,要贡献真正高级的西装。”“培罗蒙”移师香港后,正是依靠红帮的传统特色独树一帜,远播声誉,辉映国际服装界。

20世纪50年代伊始,“培罗蒙”的足迹拓展到日本,在戴祖贻的主持下,日本的“培罗蒙”不但生意隆盛,而且享誉东西方,戴祖贻被大家称为“培罗蒙先生”。

戴祖贻,宁波镇海县霞浦镇戴家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34年6

月,年仅13岁时到上海“培罗蒙”拜许达昌为师。经过10余年的磨炼和积累,戴祖贻不但增长了知识,学到了西服裁剪制作技艺的精髓,而且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了经营之道。

1950年,戴祖贻受命于业师,主持日本的“培罗蒙”。

几十年间,“培罗蒙”先后为美国前总统福特、日本内阁大臣及商界领袖、20多国驻日本大使以及文体明星等精制了数以万计的西装。

4. 红都,民族品牌领袖风采

为了繁荣、提升首都的服装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1956年3月从上海迁京的21家老企业实行强强联合,重组成6家地方国营的服装店:“雷蒙”、“波纬”、“蓝天”、“造寸”、“万国”、“金泰”;后与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北京红都时装公司。

50多年来红都一直秉承精益求精的光荣传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两会”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制装服务,曾先后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布什总统等外国首脑提供制装服务,以其做工精细、服务周到、一丝不苟而获得一致好评,并经受住了市场的严峻考验,成为名扬中外的知名品牌。

首任经理余元芳,奉化县白杜乡泰桥村人。新中国成立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在“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制作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第二任经理王庭森(见图1-2),1922年1月出生于宁波鄞县甲村。

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像上那件衬托主席领袖风采的中山装